

THE JOY OF FREEDOM

欢乐的经济学

一门关于市场经济的必读课

[美] 戴维·亨德森(David R. Henderson) 著
王志毅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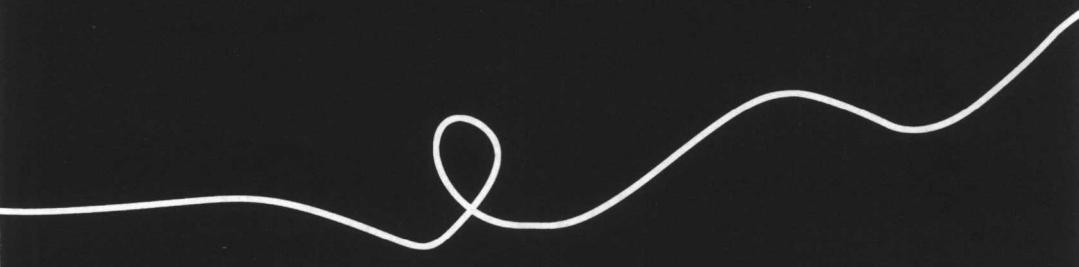


THE JOY OF FREEDOM

欢乐的经济学

一门关于市场经济的必读课

[美] 戴维·亨德森(David R. Henderson) 著
王志毅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欢乐的经济学：一门关于市场经济的必读课 / (美)

亨德森 (Henderson, D.) 著；王志毅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书名原文：The Joy of Freedom

ISBN 7 - 208 - 06426 - 1

I. 欢… II. ①亨… ②王… III. 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F0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9425 号

出 品 人 施宏俊

策 划 编 辑 王志毅

责 任 编 辑 储卉娟



世纪文景

欢乐的经济学：一门关于市场经济的必读课

[美] 亨德森 著

王志毅 译

出 版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 海 人 民 人 民 出 版 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发 行 中 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23.25

插 页 1

字 数 241,000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208 - 06426 - 1/F · 1462

定 价 28.00 元



《欢乐的经济学》探讨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们看到无处不在的自由契机。继弗里德曼夫妇的《自由选择》一书之后，成为倡导自由市场的最有力论证。沿着同样的思路，作者粉碎了支持政府插手环境规制、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传统观念，并且我们证明了为什么政府过分干预只会让贫穷永延，而非消除贫困。

THE JOY OF FREEDOM

作者简介

戴维·亨德森（David R. Henderson）生于加拿大，数学学士（University of Winnipeg, 1970），经济学博士（UCLA, 1976）。现任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加州蒙特利海军研究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曾主编The *Fortun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Warner Books, 1993)，除学术论文之外，他还为《纽约时报》等颇具影响力的媒体撰写各类专栏文章，曾担任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并在涉及税收、卫生、能源等各个领域的政策听证会担任专家证人。



献给正在世界上发展的未知文明^{*}

* 该献辞的灵感显然来自于哈耶克在《自由宪章》（或译《自由秩序原理》）中所写的献辞：献给正在美国发展的未知文明。——译者注

■致 谢

首先，我要感谢爱妻 Rena，不仅仅因为在写作本书的六年中她所给予的支持，还由于她卓越的编辑工作。其次我要感谢已故的 Roy Childs，当我在 1990 年代初构思这本书时，他便鼓励我完成它；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导师 Clancy Smith，我在第一章介绍了他对我的帮助。

经济学家 Russell Roberts 为本书作了技术编辑，他的付出远远超出了所得；我接受了他的绝大多数建议，并且非常享受和他在电话中交流工作的过程。责任编辑 Russ Hall 做了一些关键的修正，更重要的是，他的热情反应让我确信那些政治信仰和我完全不同的人也会欣赏这本书。Prentice Hall 出版社的版权编辑 Carol J. Lallier 的工作快速而高效，而且我很感激她所说的，“如果戴维·亨德森竞选总统，我肯定会投他一票。” Marshall Fritz 对第十六章做了非常有益的评论。

诸多人士以课堂传授、对话或写作的方式让我获得书中的许多观点。他们包括 Harold Demsetz, Armen Alchian, Milton Friedman, 已故的

George Stigler, 已故的 Ayn Rand, James Buchanan, Gordon Tullock, E. G. West, Alan Reynolds, Michael Prime, Perry Taylor, David Friedman, 已故的 Friedrich Hayek, 已故的 Ludwig Von Mises, 已故的 Henry Hazlitt, 已故的 Murray Rothbard, 已故的 Yale Brozen, 已故的 Merton Miller, Joan Kennedy Taylor 和 Paul Samuelson。我要向那些没有列出姓名的老师们道歉。

报章和杂志的编辑也给了我阐释自己观点的空间，他们包括《红鲱鱼》（*Red Herring*）杂志的 Jason Pontin; 《财富》杂志的 Dan Seligman 和 Rob Norton; 《华尔街日报》的 David Frum, James Taranto, Max Boot, Mary O'Grady 和 Erich Eichman; 还有《理性》杂志的 Marty Zupan, Virginia Postrel 和 Nick Gillespie。

我要感谢 John M. Olin 基金、美国企业协会和胡佛研究院的资金支持。

感谢我所在部门的前任主席 Reuben Harris 和海军研究院的教务长 Dick Elster 允许我停薪留职，这样我才有时间完成这本书。

我的朋友对这本书中的许多看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针见血的意见。我要特别感谢 Tom Nagle 和 Greg De Young。同时，我在海军研究院的学生也是本书中一些篇章的宽容的热心读者。

我要感谢 Prentice Hall 出版社副总裁 Tim Moore 这位热情而又专业的出版人，以及制作编辑 Kerry Reardon 和 Anne Garcia。最后，我的代理 Henning Gutmann 做出了——我深信他还会继续——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女儿 Karen 那充满欢乐的笑声。

序

12岁吋，父亲带我和哥哥去参观马尼托巴省温尼伯的省议会大楼。从外表看，这座建筑给人印象深刻，但里面却是一排无趣的办公室。当然，或许这只是我的想法。父亲把我们带到一个被特别隔开的地方，在那间圆型的房子里面，大理石地面的中央有一颗大星星。

父亲解释说，这是几个世纪以前存在于英国的“星室法庭”（Court of Star Chamber）的复制品。那时候，国王可以随意逮捕他的政治敌人，让他们单独站在房子的中间，然后国王的支持者们将他们团团围住，进行指控。被指控者没有权利请律师或者任何人来为自己辩护，审判的结果通常就是把他们关进监狱或者执行死刑。爸爸告诉我们，在省议会大楼里复制这样一个房间，就是为了提醒大家，人民拥有政府不可践踏的权利。我在心中暗忖，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多好的想法啊。这是自由的重要性与正确性在我的头脑和心中留下的最早记忆。

那时我当然不会知道，几年以后我会发现隐藏在限制政府权力这种观

念背后的，就是自由哲学。而今天我写下本书，不仅仅要去发现自由本身，更是关于自由的欢乐，关于自由的力量可以使这个星球上的数十亿人幸福生活的故事，这同样也是我及其他同道努力扩展自由的故事——我们的尝试时有成功。

书中许多小故事介绍了我如何通过经验、对话和阅读来理解这个世界。在第五章，你们会读到一个大企业的经理和我父亲的争吵，读到我如何从中发现私人产权制度能够保护我们免受其他人无名怒火的打击。在第八章，我描绘了自由市场所能创造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激励，以及这种激励如何影响我和身边人的生活。第一章讲述了我十几岁的时候与前任美国副总统的辩论。早年接受经济学教育的时候，我曾经在尼克松经济顾问委员会里实习，第十二章讲述了我在这方面的个人经历，这些经历让我相信多数政府在多数时间里所做的惟一事情就是破坏人们的生活，还从来不为此承担责任。

这里还介绍了一些我成为政策经济学家后发生的事情，比如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前任财政部长萨默斯，以及拉尔夫·内德等人的交流。比如在第六章，我介绍了自己参加的一次听证会，在劳工部禁止数以百计的妇女在家里织滑雪帽赚钱的情况下，我作为专家证人帮助里根政府推出了相反的提案。第二章记录了我对拉尔夫·内德的一次访谈，内德以批评不安全的汽车而闻名，同时却支持每年导致数千人死于非命的联邦法律。在第十六章，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那些让我相信公共教育已经彻底失败的人的故事。在第十章，你会看见一位经济学家梅力斯的故事，他曾作为志愿者见证了1970年代早期尼加拉瓜令人震惊的贫困，并在后来的研究中逐步揭示出贫困的原因及解决的

方法。在第四章，我介绍了 1960 年代的一位年轻盲人经济学家瓦尔特·奥：他的研究报告没有掺杂丝毫的个人利益，证明了军队征兵制是无效率的，应该被废除。

我还会提到一些重要的历史典故，并用全新的视角来阐述这些众所周知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 1964 年的底特律种族暴动，但很少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在第七章，我要讲述这件事，它会把你吓一跳。第七章还会介绍有关当年罗莎·帕克斯拒绝乘坐的那辆著名公车的重要事实。

在列举了书中会讲到的一些故事之后，我想以本书没有涉及的一则故事来结束这篇序言。有史以来最为著名和动人的音乐作品之一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它的歌词是德国诗人席勒的诗歌《欢乐颂》。席勒原来想把这首诗写成“自由颂”，但在最后的定稿中，我们看到的依然是“freude”（欢乐）一词，而非“freiheit”（自由）。这是因为，为了通过普鲁士的审查制度，席勒用“欢乐”替代了“自由”，但是充分了解席勒想法的人肯定会知道他的真正用意。到了 1989 年的圣诞前夜，那时柏林墙倒塌仅仅几周，伯恩斯坦为了庆祝柏林人获得自由，在柏林指挥了贝多芬的交响曲，在这场演出中，他用原来的“freiheit”代替了合唱词里的“freude”。用得非常恰当，你觉得呢？

戴维·R. 亨德森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致谢

序

第一 章	自由的欢乐.....	1
第二 章	迷上经济学.....	14
第三 章	任重道远.....	35
第四 章	你属于你自己.....	46
第五 章	你的财产权.....	62
第六 章	联合的自由.....	75
第七 章	关于歧视的经济学.....	100
第八 章	市场经济的欢乐.....	132
第九 章	谁的收入？谁在分配？.....	151
第十 章	梅力斯的故事.....	165
第十一章	市场德行与社区.....	173
第十二章	华盛顿之旅.....	190
第十三章	终结课税.....	212
第十四章	社会保障危机：原因及解决之道.....	235
第十五章	以半价获得自由和健康.....	257
第十六章	“公立”教育之忧.....	295
第十七章	环境：拥有它，拯救它.....	324
第十八章	我们时代的自由.....	349

第一章

自由的欢乐

在最近两个世纪，经济学被说成是“沉闷的科学”（the dismal science），发明这个词的人是英国反资本主义作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你可能永远也猜不到为什么他会这么说。我过去一直以为那是因为卡莱尔的假想敌是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后者认为农业产出只会以算术形式递增，同时人口只会以指数形式递增，因此最终将导致大规模的贫困和饥饿。我错了！卡莱尔说“经济学是一门沉闷的科学”，只是因为在 19 世纪占据经济学主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强烈反对奴隶制。^[1]所以，这其实是一项非常无稽的指控，不是吗？

对我来说，经济学永远是一门快乐的科学。它告诉我们自由（free-

[1] 有关这方面的更多资料，请参见 David M. Levy and Sandra J. Pear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Dismal Science: Economics, Religion, and Race in the 19th Century," *Contributors' Forum*, January 22, 2001, www.econlib.org.

dom) 是繁荣 (prosperity) 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你不仅能够获得自由，同时还能得到附赠的奖品：繁荣。这，就是我对自由的根本信念。

1968 年 6 月，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温尼伯

我在马尼托巴大学等着和一位加拿大政府的中层官员会面。那时我 17 岁，两星期前刚辞去在一个美丽的加拿大国家公园里的差事。要知道，这份工作轻松有趣，而且薪水很不错。要是我保留这份工作，整个夏天赚到的钱加上我的储蓄，就足够支付大学第二年的学费了。身边的人，包括我的母亲，都怀疑我的判断力是否出了问题。我的老板的老板叫我过去解释自己的行为。虽然他是否理解我辞职的原因并不影响我的决定，但我还是同意跟他见面。

我进了办公室，那位官员问我为什么要离开。我解释了原因。

我在那儿的工作是来来回回地给树贴上标签，并对这些树在不同条件下的生长情况进行记录。因为想了解这项工作有什么意义，我就问顶头上司我们的研究结果会得到怎样的利用。他解释说，由于气候的不同，这些研究结论不适用于加拿大的树。“那么它们适用于哪儿呢？”我问道。他回答说事实上最适用于苏联。我停下来，仔细思考了一阵，然后才问：“花加拿大纳税人的钱来资助苏联人，我们如何证明这种做法的正当性？”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天晚上，我回到在赖丁山国家公园 (Riding Mountain National Park) 的小屋，辗转反侧，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就是感觉不对劲，觉得不对劲的不仅是我的感觉，还有我的理性。我实在看不出向

加拿大人课税来帮助苏联人有什么正当性。

第二天，我又想到了一个新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结论可以用来帮助加拿大人又能怎样？在这种情况下，用税款来支付研究费用就是正当的吗？我想，它的正当性会强一些，但是否就“足够”正当了呢？它实际上是以剥夺纳税人的选择权为代价帮助了某一部分加拿大人。这好像也是错的。我开始回想起最近几个月在读的哲学家兼小说家、自由斗士安·兰德（Ayn Rand）的书。我突然意识到，她已经以一种很清楚的方式指出了问题：用向一些人课税的方式来帮助另一些人，实际上是侵犯了被课税者的权利。最后我得出结论，为了这个项目而向无辜的加拿大人课税，不管得益者是谁，都是错的。于是，理所当然，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我必须离开。我一整天都在考虑我的想法，想找到其中的破绽。毕竟，这是份好工作，而且为了获得这份工作我花了不少力气。我们住得好，吃得好，工作轻松，还蛮有意思，而且待遇也好。我真不希望放弃这份工作。但是一想到付给我薪水的是那些不知名的纳税人，而且他们被剥夺了发言权，我就觉得良心有愧。“道德上的确定性”（moral certainty）* 和一股隐秘的力量在迫使辞职。那个晚上，我告知老板我要在本周末离开。

我把这些都告诉了我在温尼伯的老板的老板。他是个很好的人，没有嘲讽我。相反，他试图用科学研究自身具有的价值来说服我。我提醒他，我所质疑的并不是他这个项目的价值，而是实现它的手段——用纳税人的钱来买单。他竭其所能地劝说我。但我渐渐发现，不是我在竭力证明自己

* Moral certainty 指的是那种足以对付实际生活的确定性，尽管并没有到绝对的确定程度。在这里，作者指的是他感到自己也确实参与了这件不正确的事情。这个概念的翻译参照了苏力所译波斯纳的《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8 页。——译者注

的选择，反而是他要努力证明他所做的事情的正当性。几个月前，阅读兰德的书，并用她的观点来和那些比我年长的人辩论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在我驳斥了所有的标准反对理由后，他们提出的主要异议就是：生活不会像我说的那样运转，你无法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坚持所谓的理想。但现在，我正在让理想与现实对质，而我突然感觉有了力量（power）。这是一种非常纯净的力量，不是去超越别人，而是超越自己。

在回家的路上，我进一步思考刚才发生的事情。母亲教育我要用逻辑来思考问题，并且坚持自己的原则。父亲用言传身教的办法教育我不偷窃、不说谎、不欺骗。安·兰德的推理看上去就像是逻辑的下一步那么必然。我没有做任何与我所受家教相违的事，仅仅是沿着她的思想走下去，就得出来了一些以前连做梦都没想到过的结论。最主要的结论就是政府没有权利（right）操纵人们做某件事。我身边的许多成年人都很担心我——这一次，让人不快的是，那些人也包括我的母亲——他们试图说服我去调和（moderate）自己的观点，却没能给我这么做的好理由。对他们来说，不需要考虑事件的背景，调和本身就是一种美德。我受到了诱惑。考虑到从小接受的教育，我或许也不会屈从于这种诱惑。但如果那时我能够计算出我所信奉的哲学的力量有多大，那么这位40岁的成年人试图说服17岁的孩子的方式几乎是徒劳的。

1968年8月，温尼伯

我坐在我的朋友唐·雷德克的位子上，阅读新一期的《新闻周刊》。一篇叫“该死的公共设施”的文章吸引了我。这篇文章分析的

是美国邮局，作者认为“该死的公共设施”正可概括邮局的服务态度，因为它拥有投递第一类邮件（first-class mail）^{*}的法定强制垄断权。整个推理非常有说服力，并且充满热情，完全没有兰德式的愤怒。作者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名叫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在读完“该死的公共设施”之后，我翻出唐的一堆旧《新闻周刊》，在里面寻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其他文章。当那一堆看完之后，我又在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更多弗里德曼的专栏文章。我喜欢他写的所有东西，不论是否同意他的具体观点，当然一般来说我都是赞同他的。我特别喜欢其中一篇反对征兵制（military draft）的文章，并不是因为他反对越南战争，而是因为他认为征兵制是一项束缚年轻人自由的非正义之举。弗里德曼的文风在任何时候都是逻辑严谨和热情洋溢的，偶尔也夹杂着义愤，但绝不是那种我已经有点厌倦的兰德式咆哮和不时爆发的狂怒。我找到了一个智识和精神上的心灵伙伴（soul mate）。

1968年9月，温尼伯

这是温尼伯大学1968～1969学年注册的第一天。填完表格后，我走到搞迎新活动的地方。一张桌子旁立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自

* 按美国邮件的分类方式，第一类邮件是投递速度最快的，主要包括信件、邮简、明信片等。

——译者注